

敬悼孙国华先生

孙国华先生不幸于1958年2月8日晚,因心脏病发,突然逝世。噩耗传来,大家不胜悲痛。

孙先生系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,兼哲学系副主任及校务委员;同时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,中国心理学会理事,心理学报常务编辑。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前辈。孙先生的逝世,不但对北京大学心理专业来说是丧失了一位领导者,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及全国心理学界来说也是一大损失。

孙先生生于1902年。山东濰县人。1914年至1923年求学于北京清华学校。1923年赴美,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学院和研究院及芝加哥大学生理系求学。1928年8月得心理学博士,是年底返国。其后即在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东北大学、北京师范大学等处任心理学教授;在清华还兼任心理系主任工作。



孙国华先生
(1902—1958)

孙先生自开始教学到逝世,工作30年。虽在1941年8月到1946年7月抗日战争及复员时期,曾因心脏病关系,暂时脱离了心理学教学岗位,就任于前国立编译馆,但他一生都是从事学术工作的。

孙先生重视心理发生与进化的问题,在这方面有甚高的造诣。他在1930年以前,在国外发表过三篇论文,两篇是关于动物心理的,一篇是关于

新生儿的行爲。最后一篇很长,单印成书,是儿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著作,为各国研究儿童心理者所熟悉。他对心理学的贡献,并不至于他自己的学术成就,还为心理学界做了不少的组织和培养青年干部的工作。孙先生曾三度领导清华心理系;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,又一直领导北大心理专业;后来又兼任领导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生发展心理学组。孙先生做学问极其踏实,不争名,痛恶掠人之美,不急于多发表文章。有些手稿未及发表毁于抗日战争中,现在无法再得。他自己发表文章虽不甚多,但他指导了许多青年干部做研究工作,发表了不少论文,得他帮助指导而在学术上有成就者很多。解放后,在党的号召下,他领导了北大心理专业的教师从事研究巴甫洛夫学说的工作,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条件反射实验室。孙先生对心理专业学生的培养也很注意,重视培养同学的专业思想;给同学做报告总是热情洋溢,以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鼓励同学们热爱祖国的心理学事业。在专业工作中,他也不辞辛劳,一心希望能将心理专业办好。孙先生还积极参加全国心理学界的活动,他参加了心理学会与心理学报的工作,非常注意全国心理学界的团结工作。

1956年他参加了心理学12年发展远景规划工作,更注意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的合作。他认为只有全心理学界团结无间、充分合作,才能使心理学更快地赶上国际水平。

孙先生解放前不肯和反动派同流合污。在抗日战争时期,虽然身体多病,生活艰苦,但不为国民党高官所诱,拒绝参加国民党。富有民族气节,拒绝将他珍藏的一部字帖高价卖给日本人。孙先生具强烈的正义感,在国立编译馆时期,看不惯一些腐败的情形,常常气得发颤。他对待旧社会的黑暗非常痛恨,但对亲友、学生、被领导者等都非常可亲,常竭力给与帮助。

解放后,由于党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,孙先生从原来脱离政治、厌恶政治的清高思想,逐渐变为关心政治,积极地参加了各项运动。在工作中依靠党,有事常与党组织商量。自从周总理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,孙先生认真考虑了自己的政治进步问题,曾表示要争取入党。

孙先生以高度积极性参加了整风和反击右派的运动。通过整风和反右派运动,孙先生在政治觉悟、工作积极性及责任感方面有更大的提高。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政治和业务、红与专必须结合,不能单强调一方面。他认为过去心理专业在政治方面重视不够,他说他今后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同时在具体工作方面他也有所计划,在青年干部的培养上,他也具体地在考虑如何使红与专结合。对于整个专业的工作,根据整风精神及在民主德国参观的体会,他也正在重新考虑。他一生渴望着把心理专业办好,并认为通过这次整风和反右运动,有可能使心理专业能较彻底地改进。可惜孙先生突然病故,不能亲自领导同志们来实现。

目前正是全国大跃进时期,心理学界也要大跃进,正需要心理学界前辈挺身而出领导。孙先生不幸于此时逝世,对心理学界实在是一大损失,使大家更感到非常伤悼。我们今天来纪念孙国华先生,应当照孙先生生前志愿,紧紧地依靠党,在党的领导下,全国心理学工作者紧密地团结起来,争取中国心理学的大跃进。